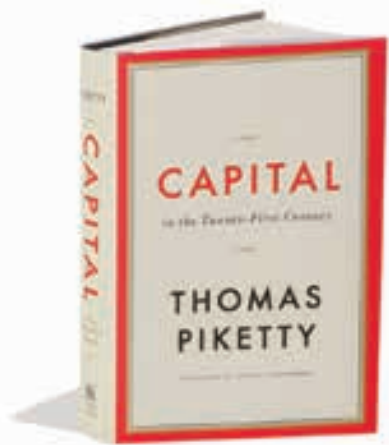


# 超级富豪的崛起



托马斯·皮克迪

##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贝尔纳普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2014年，685页，39.95美元（精装）。

这本具有重要意义且令人手不释卷的书当仁不让地跻身近几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分析书籍之列。近年来有关不平等的大部分争论要归因于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及其同为研究员的同僚们的努力。

早期有关不平等的研究专注于通过家庭调查获得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基尼”系数（基尼系数主要衡量一国的收入分配情况）。但是，基尼系数忽略了多数顶层人士的收入分配情况，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富豪们往往会隐瞒自己的部分收入。此外，这些家庭调查最多只能衡量收入而非财富。

皮克迪不辞劳苦地找到了新的数据源，并说明在近几十年间收入不平等情况急剧恶化。在美国，不平等情况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虽然其他几个英语国家的情况稍好，但也不容乐观。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占有1%比例的超级富豪与普通人的工资差距。（我希望这本书针对将收入不平等加剧归因于数据失真的评论做了回应。）

对此，一个标准解释是虽然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教育并未与此同步。皮克迪说这个解释站不住脚。这甚至无法解释为何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之间也会出现不平等加剧的状况。

这些高工资能反映首席执行官带领企业创造更高价值的能力吗？不能，“赢者全赢”因素大概也会在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其他发达经济体发挥作用，在这些经济体中，我们并未看见相关的工资增长。

或许这些国家忽略了技术变革对工资的相对意义，因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开始加剧之时，导致其中一些国家增长减速。但是，大概自1980年以来，两类国家的实际人均增长基本相同。

对皮克迪而言，最可信的解释主要从文化和政治出发——尽管他在本书中并未充分提供有关这两方面的清晰证据。皮克迪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英美两国的政治精英都在参与激进的市场改革，这些改革降低了顶层人士的税率、抑制了最低工资的增长、削弱了工会，并促成了被视为可接受的薪水差异发生变革。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允许精英们选择彼此的薪水，所以他们的工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皮克迪认为，要解决这一状况就要扭转上述变化。他指出，尽管英美两国降低了边际税率，使其低于其他国家的同行的水平，但其增速并未因此加快。

工资不平等仅出现在几个国家内，但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财富分配却极不均衡。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更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改善了这种不平衡。与此同时以及整个20世纪70年代，征收富人税和高遗产税的公共政策实现了稳定的财富分配。

但这样的改善可能仅仅只是短暂的。该体制对小人物存有偏见：相

较于不太富裕的人，富人获得的收益更高，而且积蓄更多（这是假设，因为皮克迪并未详细描述储蓄利率）。同时，人口已经停止增长，生产率增速也正在放缓，这意味着当今社会大有朝19世纪的模式发展的趋势，当时继承财富支配着社会发展。

皮克迪认为，这样的社会与现代西方国家倡导的精英和民主价值观是相悖的。上一次，因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财富分配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皮克迪依然乐观地认为，创意（以及数据）能够

## 该体制对小人物存有偏见。

影响政策。他在书中推荐应对各种形式的资本征税，这将要求国际协调并可能要求跨国资本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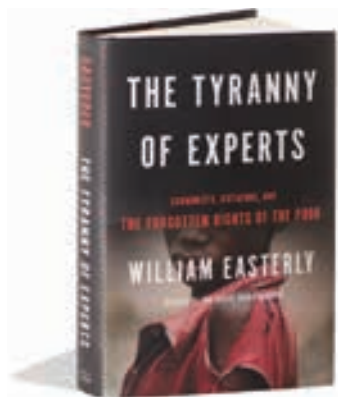
经济学家可从这本书中获得很多启示。本书提醒他们，其衡量反映了政治选择，这可能并不受经济学家的欢迎。同时，本书还警告他们要谨慎对待将近几十年视为某种“稳定状态”的观点：二战后收入和财富的演变不过是之前事件的还原，这个观点与多数人的观点一致。此外，本书还提醒，相对于复杂的统计数据和模型，事实一经收集和整理后，对其进行简单的对比会具有修饰和解释的效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在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进行评论时说道，“一旦有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就很难思考其他事情了。”但是，读者们接受到的想法是，增长产品的分配将决定未来25年或50年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特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安德鲁·伯格  
(Andrew Berg)

IMF 研究部助理主任

# 以权利促发展



威廉·伊斯特利

## 专家暴政

Basic Books, 纽约, 2013年, 416页, 29.99美元(精装)。

我很喜欢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新书的前提和结论, 而之间的300页内容却没给出多少值得祝贺的理由。

伊斯特利认为, 发展已被技术官僚所绑架: “技术官僚错认为缺乏技能是贫穷的原因, 然而贫穷的真正原因是缺乏权利。”原罪来临的一刻就是世界银行的成立(IMF差一点点就上榜了)。由此引发的争论被写得非常地讨人喜欢, 将一些原本枯燥无味的概念性争论包装成吸引人且富含人情味的故事, 从而使其变得生动起来。

对伊斯特利来说, 个人是英雄, 不论是无拘无束地去改变世界还是被政客们的诡计所困惑。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 甚至是好莱坞式的, 呈现人类现状。他对权力的观点可以用书中谈到制度的那个章节的标题来概括: “如果可以, 我们就会征服他们。”

伊斯特利的精神导师是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他对那些创立了放弃自由选择和个人主义的特殊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 诸如纳纳·缪达尔

(Gunnar Myrdal) 和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 表示不屑。

书中叙述有关技术官僚论的起源发人深省, 伊斯特利把它追溯至1919年(并不是杜鲁门1949年的演说, 这通常被认为是援助的开始)。他认为技术官僚源于为了转移人们对权利议程的关注的诉求, 不论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的反华歧视, 英国抵制战后殖民地自治化的意图, 还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公民权利斗争。他在最近的战争中找到直接联系(冷战、反恐、禁毒), 当侵权者站在西方阵营的时候, 对技术官僚式的发展的关注就变成他们用来掩人耳目的手段。

随时准备漠视权利是所有独裁者最喜欢听到的声音, 他们强行以规划者的手段(或者起码以它的语言)作为无视反对者并巩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方法。他认为, 抛弃个人权利是“当今发展的道德悲剧”。

我非常同意这几点: 他对忽略了全国和当地具体情况的白板式规划的批判; 以更高的国家利益为名滥用个人权利; 以及只求效率的草率的方案, 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巧妙地把规划者与反进化论者划上等号)。

伊斯特利甚至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的怀疑论者: “如果有一个数字可以愉快地牺牲数百万人的权利, 那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但他的论点在中国(或更广泛来说, 在东亚)的问题上行不通。面对历史的真实情况, 即东亚在不同的专制体系下(所谓发展型国家)实现了高速增长, 倡导美国梦的人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接受增长与权利之间可能发生的取舍, 要么就是尝试着把东亚的奇迹解释为是一种个人权利与市场力量的胜利。

1993年世界银行试图以后者提出它那个备受讽刺的所谓东亚奇

迹, 但伊斯特利把问题翻转过来看, 却使其显得非常无力: “有证据显示, 中国之所以成为经济大国不是因为邓小平的经济政策, 而是因为那些到处奔波的无名小卒。”这样说显得有点令人绝望。

通过进入权利的领域, 他在早前的《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书中进一步解释追寻者和计划者的区别——其本质的对立, 我发现这一点在过去几年里非常有用。但他对权利的理解是有选择性的和错误的。对于伊斯特利来说, 权利一直是个人的, 而永远不会是集体的——他没有提及工会、妇女或原住民的运动或生产商组织等。

如果有一个数字可以愉快地牺牲数百万人的权利, 那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此外, 这种为权利作斗争的个人英雄形象在美国历史上被广泛描绘, 却完全忽视了近几年在推动人权方面比其他人做得更多的机构——联合国。那些在纽约的卑鄙计划者和官僚们理应在全世界为所有边缘群体争取人权, 这显然与本前提相矛盾, 所以必须把他们排除出去。

最后, 伊斯特利的结论是, 如果你关心权利, 你就应该反对援助。我的意见则正好相反。做得好, 援助就可以支持穷人(个人和群体)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我在为乐施会(Oxfam)工作时就目睹了许多国家在这样做。

邓肯·格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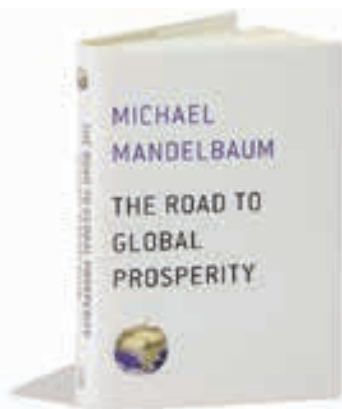
(Duncan Green)

英国乐施会战略顾问  
博客《从贫穷到权力》

(From Poverty to Power)的作者



# 政治经济学的进展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

## 全球繁荣之路

西蒙与舒斯特公司, 纽约, 2014年, 272页, 28美元 (精装)。

全球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全球联系日益紧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而了解全球化的优劣势或会成为一个核心问题。诸多政治家的做法都比较实际——正如那句老话所言，“相对于被跨国资本主义剥削，更糟糕的事情则是不被其剥削。”然而，全球化支持者和批评者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却莫衷一是，并呈现出非常严重的两极化状态。支持者认为，自由贸易、开放的资本市场以及人类的自由流动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引擎，而批评者却认为上述这些活动只会给社区和环境造成破坏。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 (Michael Mandelbaum) 属于支持者。他的新书就像一缕春风，易于理解且充分以事实为依据。在书中，曼德尔鲍姆试图重述乐观者的观点，同时适当降低支持者的热情，让其符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心态。他的核心观点很简单：如果经济学是解决之道，那么政治学就是问题所在。“全球经济成功运行之时——也正因如此——能激起反对的声音，进而造成政治冲突。”

粗略地介绍自由贸易理论以及

快速地回顾近期的经济史主要事件之后，该书开始大幅描写政治如何阻碍理性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所谓的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混乱而腐败的民主政治会让印度付出代价。但是印度的破坏性会比中国更严重吗？相对于西方的制造业员工，中国在服务领域的竞争力将会给全球带来更严重的威胁。俄罗斯必须严打贪污——2005年，贪污金额在其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20%。此外，俄罗斯还面临着不健康的民粹主义、独裁主义和效率低下等问题，“高昂的能源收入足以导致大规模的腐败并阻碍稳健增长，但还不足以让俄罗斯实现其向往的生活水平。”巴西也同样

## 如果经济学是解决之道，那么政治学就是问题所在。

面临着民粹主义的问题：养老金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达到13%，而支持增加公共支出的人也可能超过“以经济史为依据、希望审慎行事的人”。

曼德尔鲍姆总将破坏经济理性的原因归咎于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民主制度下的民粹情绪。这种观点的立论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该定理提出，贸易会让一国整体受益，但是这种益处的分配是不均衡的。

您可能会认为，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引发的一个明显问题是如何处理社会发展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如果贸易让一国整体受益，但是一些人却因此遭受损失，那么合理的情况就是共同承担收益和损失。政策和政治学领域的人都深谙这一点。但是，显然作者不这么认为。曼德尔鲍姆并未对“占领华尔街”运

动以及其他不以此种方式探讨全球化问题的人士做出回应，其他人主要探讨1%的富豪和99%的平民之间极不均衡的收益分配问题，以及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之间越来越大的鸿沟问题。

作者在书中表明其探讨的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但一涉及政治问题，尤其是全球解决方案时，该书就显得非常稚嫩。曼德尔鲍姆在书中说，“现在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可以解决当前的全球经济秩序问题。”大学生如果发表这一言论，他的成绩就是不合格。目前或许没有一个全面可行的替代方案，但是各国央行、反全球化主义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已经提出了各种政策。作者至少应该对这些政策发表一些评论。

曼德尔鲍姆的预测非常乐观：“全球经济将继续增长。这种增长将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富裕。尽管这并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至少是可能趋势。”我希望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书中的很多内容，我都赞成。如果您想让一个非西方人了解美国精英的世界观，该书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该书信息量丰富、易于理解。

但是，书中的论点最好理解为是问题的提出，而非解决之道。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acNamara) 总结道，该书的重大战略失误是缺乏移情，而非分析。这本书的参考书目基本全由美国人编撰，并且主要用英语书写，因此作者很难理解平民，而非精英的世界观。这本书的主旨是探讨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全球繁荣的问题。该书的缺点是语气自满、眼光狭隘——这对该书而言的确有点讽刺。

杰夫·摩根  
(Geoff Mulgan)

“The Locust and the Bee: Predators and Creators in Capitalism's Future”的作者  
英国国家科技艺术基金会首席执行官